



陈新民：南方的母亲和我的「扎根树」

扎根树：在大丰林场做知青

1974年3月,18周岁的我就和上百个同学一起,下放到丰林农场做了“知青”。

林场在黄海边,当时异常的荒凉。东边是无边无际的滩涂,再往东,就是滔滔黄海。滩涂的西面是海堤,海堤以内就是林场了。

林场其实就是农村,除了种树,我们还要种麦子,种蔬菜,以及围绕这些农活而展开的挑大粪、施肥、浇水、打农药等粗活,我们什么都干。此中艰辛,自不待言。要问何时是出头之日?那时候只能答,不知道。

说心里话,那时人人都想回城。可下放容易,回城又谈何容易?在当时,回城有4个渠道:一是被城里的工厂“招工”进城;二是进大学做“工农兵学员”;三是想办法弄个什么慢性病的证明来,办个“病退”;四是先去当兵,然后过几年退伍(能混到个军官转业更好),来个“曲线回城”。要能做到这4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点,都必须有个前提,那就是你的家庭要“有门路”。换言之,就是你的父母或者亲戚中有做官的,而且官越大越好!如果你就是个普通老百姓人家的孩子,那就基本没希望了。

不过,即使是有门路,也不能做得太“赤裸裸”,以免引起众怒。为了掩人耳目,需要这些“有门路”的“知青”先要“表现好”,以便将来做材料时好看些。其中一个表现,就是栽“扎根树”。所谓“扎根树”,就是栽一棵树,以表示自己坚决在农村“扎根”(就是干一辈子的意思)的“坚强意志”。你看,明明是朝思暮想要离开农村,却还要栽什么“扎根树”,多假啊?

我个性很犟,认死理。明明本身就是林场的知青,每天都在栽树,为什么还要特意栽个什么“扎根树”?哪棵树不是扎根在泥土中的?我天天去栽树,就是不



1975年,林场知青曹季滨(前排右)应征入伍,图为曹季滨(前排左)、袁宏生(后排左)与作者(后排右)欢送他时的合影。

宣称哪棵树是“扎根树”。有个高中和我同班的女同学就不一样了,四处高调宣传她栽了“扎根树”了,其言行几乎令人以为她要立遗嘱嫁给本地的农民子弟。可是,不到年把时间,这个女同学的老爸——县里一个副食品厂的厂长,就替自己的宝贝女儿办了个假病历,弄了个“病退回城”,把户口也迁回去了,把她户口声说的“扎根树”来了个“连根拔”!而像我这样的没有栽“扎根树”的主,却扎扎实实在林场干了4年,直到邓小平小平决策恢复高考,才通过自己的勤奋进了高校。

到今年,距我们下放林场已经43年了。当年那个因为“生病”而“病退”回城的女同学,也健康康地生活着。原来,人家本来就没有什么病,都是假的!

家乡书 家国情怀家乡书

陈新民,江苏大丰人。毕业于盐城师专(今盐城师院)中文系,1984年调任新华日报记者,参与创办扬子晚报,任新闻部副主任,资深媒体人。江苏作家协会会员,现任江苏省人才流动服务中心联合党委委员,保通数据技术(江苏)有限公司董事。

77届高考：离开农村的机遇

1977年冬,我还是苏北大丰林场的(现在的麋鹿自然保护区即是当年大丰林场的一部分)的一个“知青”。

忽一日传来消息,国家恢复高考了。而且即使是我们这样没有任何家庭背景背景的知青,也可以参加。于是大家就有了报考的念头,把它看作是离开农村的救命稻草。

那时,我们4个男知青,住在同一个茅草棚里。时间很紧迫,大家几乎没有心思出工,急急忙忙就开始“复习”。然而有什么好“复习”的呢?一来根本没有“考试范围”“高考指南”之类的材料,也不知道考什么;二来我们手头仅有几本不知从哪搞来的数理化方面的课本,其他什么学习书籍也没有;再者没有老师指导,且1966年“文革”开始时,我们还在念小学,此后虽然一直上到高中毕业,但在那个年代,时间都用在“学工”“学农”“学军”和“大批判”之类的政治运动上去了,真正上数理化的课程少得可怜。严格意义上来说,我们从小学阶段起,就没有好好地上课,加上底子薄,初中、高中的课也就更学不进去。因此,充其量我们此时都只有小学学历,现在居然要来参加高考,谁敢说有这个信心?

“唉,复习什么哦。反正也考不上,不如打牌吧!”不知是谁的提议,说到大家的心里去了。于是郁闷的我们开始玩扑克牌。玩了几分钟,又有人说了:“哎,光打牌也不行啊!还是复习吧!”想想也对,打牌能够打进大学吗?于是丢了扑克,又捡起了那几本已经翻烂了的课本。不一会,又有人说:“拉倒吧,看了也考不上的,别做白日梦了吧!打牌!”对,打牌!大伙又扔了课本,抓起扑克。打了一圈,又有人说了:“还是看书吧,不复习恐怕就更考不上啦!”“你说的不对,复习就一定能够考上吗?”有人反问道。“复习也不好,打牌也不好,那怎么办?”大家面面相觑,“不如我们抓阄,看谁能够考上!”

哈哈,这个提议好!人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的最后一招,就是靠唯心主义了。我们做了最乐观的预测:我们四人中有最后三人能够考取,只有一个倒霉蛋没有考上,这个概率够高了吧。然后拿出三张红色的扑克,代表考取,一张黑色的,代表名落孙山。牌背朝上,洗了又洗,放到桌上,开始摸牌。很快结果出来了:他们三人,摸到的是红牌,唯独那张黑牌,落到我的手中。他们欣喜若狂,犹如真的金榜题名一样兴高采烈;而我呢,虽然心里不是滋味,但也不算坦然。因为,我们四人中,我的学习成绩本来就是最差的。何况,这不过是个玩笑而已。

没几天,预考(初试)开始了(那时高考分两步走:首先是预考,通过预考的才能再参加正式的高考,即复试)。又过了几天,我们在打篮球的时候,听到林场广播站公布本场知青通过初试、进入复试的知青名单。那三个摸到红牌的“幸运儿”,居然均榜上无名!而我这个“倒霉蛋”,却通过了预考!哈哈,命运啊!我把篮球一丢,躲进茅棚一阵大笑!

没有通过预考,他们三个浑小子就死了心。我呢,既然获得了参加最后考试的资格,也就按照程序去考。我的数学一塌糊涂,所有题目都不会做。考卷第一部分是判断题,也就是在题目旁边的括号里打钩或打叉。反正我都不懂,就闭着眼睛乱打一气,对还是错,就由上帝老人家去决定吧!其他题目就更不用做了,直接交白卷!结果我是考场上第一个交卷的。其他人还以为我数学很好,甚至对我投来羡慕的目光。殊不知大摇大摆走出考场的我其实是个“白卷先生”!

幸好,我只是偏科而已。数理化虽然不行,文科却是我我的强项。结果,在后来公布的通过复试的考生名单,幸运的我又一次榜上有名!接下来就是“政审关”。说到“政审”,现在的孩子们应该是不知道了,可在



1976年,作者时年20周岁,与一同下放大丰林场的知青的友人合影。前排蹲者(左起):袁新毅(后知青返城时回老家无锡,曾任无锡鹤鸣皮鞋厂厂长)、作者;后排站立者(左起):徐景荣(曾任东台农行行长)、徐安(曾任大丰财政局干部)。

五、六、七十年代甚至八十年代初期,任何人要参军、入学、招工、入团、入党、出国,无不要进行“政审”,“政审”不合格者,就一票否决。而“政审”是否“合格”,关键就在一个字。那个字?容我慢慢道来。

原来,当时的“政审”,主要是看其“政历”(政治表现历史的简称)。写法上主要有“政历清白”和“政历清楚”。别小看了“清白”的“白”字和“清楚”的“楚”字,一字之差,天壤之别!“政历清白”,就意味着你的政治表现是好的;反之,“政历清楚”,则说明你的政治表现有问题,但是已经查“清楚”了。不过既然政治表现有“问题”,那你的“政审”还能通过吗?

我清楚地知道,我自问平时虽然顽劣,但是既无“政治问题”,也无偷鸡摸狗,没有受过任何处分,“政历”当然是“清白”的。但是,林场的最高统治者“革委会”主任(已去世),是个极左的“老革命”,而我平时没有对他表示出足够的“尊敬”,而且有时对他还有些不敬之举,早已成了他的眼中钉、肉中刺,恨不得找出差错来把我送进牢房。这次如果让我考上大学离开林场,对他而言是“放虎归山”,对我而言则是“胜利大逃亡”。因此,他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,给我来个“莫须有”的“政历清楚”,那我岂不就要功亏一篑?

我打听到负责“政审”的是林场一个姓陆的人秘股长,于是去找陆股长打听情况。陆股长是退伍军人出身,与我的关系尚好。他告诉我,革委会主任果然授意他,在我的政审材料上要写“政历清楚”。听闻陆股长好酒,我连忙请他到县城我家喝酒。

那天,父亲在家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宴款待陆股长。父亲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军人,席间与陆股长聊起淮海战役、渡江战役,两人把酒言欢,推杯换盏,俨然成了老朋友。这样一来,陆股长再也不好意思给我写“政历清楚”了,我也就顺利成了“政历清白”,成功走进高校,成为一个今天称之为“77届”的大学生。

而今,我们当年抓阄看谁能够考取大学的4个“知青”,虽已年过花甲,却都还健在;而陆股长却早在一次宴会上,因饮酒过量倒在酒桌上。可是,他却是我人生转折点的关键人物,我至今还时常想起他。

定居大丰：坐着马车去上学

我的父亲叫陈纯,大丰三龙镇人,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。

他17岁参军,先后参加过淮海战役、渡江战役及福建、广东等地的剿匪等,两次负伤。1964年时军衔为大尉(这个军衔现在已不复存在),正营职。

1964年,父亲在闽西永定县武装部作训科科长任上面临转业,何去何从是个问题。按照当时的政策,他可以选择回大丰老家,也可以选择留在永定县。

我的母亲叫吴珍,祖籍广东潮州,出生于香港,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,曾连续多年任大丰政协委员。

我母亲是典型的南方人,她深知江苏冬季严寒,非常担心孩子们无法适应江苏的寒冷,坚决主张父亲留在常年气温20多度的永定县转业,不回大丰。这就形成了两种意见。

那时我们兄弟姐妹6人还小,我也才上小学二年级。父母开始做我们的思想工作,各自“拉拢”阵营。母亲说:“大丰那里很冷的啊,你们会很不习惯的!”父亲则说:“大丰冬天下大雪好看呢,可以打雪仗、堆雪人!”

永定县那个地方,冬天连下霜都极少见到,更谈不上看到雪了。那纷纷扬扬的白雪,对我们的吸引力太大了。我们这些小屁孩一叫嚷:“我们要去大丰!”母亲没了辙,败下阵来。

其实在想想,父母完全是逗我们玩。究竟去哪儿,还不是父亲说了算?

于是,父母把要运到大丰的东西装箱托运到大丰。我们一家八口,先坐公共汽车到龙岩,在招待所里住了一宿。次日乘火车到了上海。在上海呆了一天,母亲把我的两个姐姐带到理发店,烫了当时很时髦的卷发;给我和弟弟买了个小皮球。然后,再从上海坐轮船到南通,住一晚,再从南通乘长途汽车到了大丰。父母一路艰辛,自不待言。

到大丰以后,由于一时还没有解决住房问题,我们全家住在大丰县政府招待所(后来也称县一招)。直到父亲被分配到丰建筑站(即后来的大丰建筑公司)任党支部书记,才搬进了建筑站的简陋住房——那是一排平房,住着建筑站的干部、职工,有拖家带口的,也有单身的。没有自来水,房子前面有个水质浑浊的小水塘,各家吃水就靠它,须得拿勺子舀进水桶里,再倒进家里的大水缸,并放些明矾以沉淀杂质才能用。水塘旁边就是农田。记得有一年里种植了一大片黄麻,比成年人还高,我经常独自钻进黄麻林里玩耍。

开学了,我们6个兄弟姐妹中的4个,转学进了大丰实验小学就读。只有一对孪生妹妹那时才4岁,只能上幼儿园。

大丰地方不大,县城所在地大中集,巴掌大小,周边全是农村。我们姐弟四人上学,一般是步行。家门口有个驾着马车跑客运的叔叔,有时好心顺路带我们去学校;母亲过意不去,会拿点钱(也就几分毛把钱)给车主。我们挤坐在马车上,感觉非常快乐。到校门口下马车的时候,面对同学们羡慕的目光,便更加骄傲——那个年代,能坐着马车上学,该是多么风光的事。

可惜好景不长,没多久马车夫和他的马车同时消失了,我们只能依靠两条腿去上学了。我们姐弟几个一路走着,奔跑着,迎着朝霞去,迎着晚霞归,所过之处,有时是绿油油的麦地,有时是白花花的棉田,何其惬意!当然,遇到风雨天,脚下是泥泞路,身上难免被淋湿,那时也就个个狼狈不堪了。

记得开学的第一天,吃早饭的时候,父亲把我们喊到一块,说:“你们要开始学说大丰话,我来教你们说。现在学第一个:‘我’。”说罢,父亲开始教我们:“‘我’在大丰话里是‘嗯’,这个‘嗯’是上声。”于是我们一块大声说:“嗯!”父亲和我们大笑起来。

不久,母亲谈之色变的严寒终于来到了。我们也真正尝到了寒冷的滋味。我们个个起了冻疮。有的在手背,有的在脚上,还有的耳朵和脸上都遭了殃。任何防冻措施——穿大棉鞋、厚袜子,戴棉帽,戴手套等,都毫无作用——冻疮仍然对我们大举进攻,所向披靡。尤其是母亲,每年冬天她的手背都肿了起来,而且裂了许多道口子,不仅渗血,还既疼又痒。这种情况下,她作为家庭主妇,还坚持做大量的家务事,其中包括把手放进冷得刺骨的水里洗洗涮涮,痛苦却又没办法。那时没有热水系统,也没有空调,家里到处冷如冰窖。每到这个时候,母亲就要数落父亲,责备他不该选择回大丰。父亲也好像理亏似的,大多数时候都只是沉默,实在被母亲唠叨得受不了了,就会出去转一圈。每年冬季,这样的场景时常发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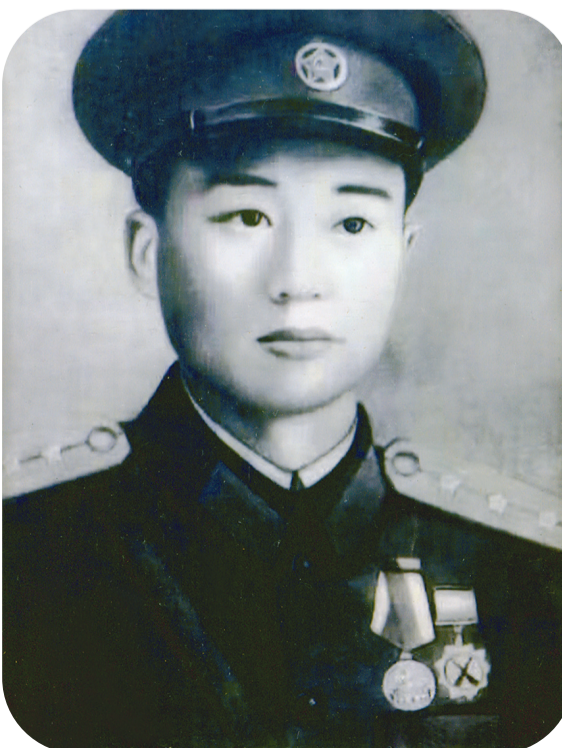
和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一样,我们全家吃尽了所有大丰人吃过的苦头。虽然一开始有点“外来户”的意味,但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们自然而然地就融入了大丰人中间。母亲说话的口音,虽然还带有明显的广东腔,但言语中也会不时冒出一些大丰本土才有的方言。如“有得忙才有得吃”(意即有活干才能有饭吃)。而我们因为年幼,很快就掌握了全部大丰方言,并对大丰产生了深厚的感情。

在融入大丰社会的过程中,最困难的当属母亲。我们这些小孩有同学作伴,又不懂事,地域观念、家乡观念也没有养成,很快就认作了故乡。而母亲就不同了,她举目无亲,语言又不大通,身边连个熟悉的朋友也没有。幸而,她生性开朗乐观,逢人又热情,这才渐渐有了朋友乃至非常知心的朋友。

今年三月,父亲走完了87岁的人生道路。我们再三做母亲的工作,请她老人家在南京、上海、吴江、昆山、佛山定居的子女中任选一个养老。但母亲总是坚定地:“我哪里也不去,就在大丰!我习惯了!”

而我,到南京定居至今34年了。几十年来,经常被人问起我是哪里人,我都明确回答:大丰人。填写个人表格时,“籍贯”一栏中,小的时候写的是“福建永定”,而后早已写成“江苏大丰”。

我在南京有很舒适的住房,定居南京的女儿女婿也有自己的住房。但是,2016年春节前,我还是在大丰城东新区的荣润理想城买了个欧式的住房,或者,这就是我将来养老的地方了——佛说,从哪里来,还到哪里去。定居大丰,乃我所愿也。



父亲陈纯



母亲吴珍

第003期《家乡书》内容预告:

晴朗的夏夜,屋前的大场清扫得干干净净。吃好晚饭,邻居们陆陆续续地散落。大人们啦啦啦啦地摇着破芭蕉扇,孩子们叽叽喳喳地追打嬉戏。外公开讲了,他不带太多的手势,很轻松地斜倚在藤椅上,基本是靠声音的抑扬顿挫夺人。伴着微风,伴着蛙鸣,我知道了岳飞大战兀术,关公义释曹孟德,七仙女下凡时好像祥云也在我的身边萦绕,玉兔守寒窑时我为她一掬同情之泪……有时候夜深了人散了,我会闭着眼睛假装睡着,躺在乘凉的长桌上,让外公和妈妈把我搭回家,桌子一晃一晃的,是摇篮的感觉。

宣丽华:理想,在洋岸的月光下拐了个弯